

智媒时代的网络谣言研究：多模态网络谣言、自动事实核查与数字鸿沟

贾浩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127; 1260793004@qq.com)

摘要: 本研究基于智媒技术迭代视角, 运用CiteSpace对2014-2024年网络谣言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移动社交时代研究聚焦社交媒体谣言传播路径解构, 形成以机制分析为核心的“传播解析”范式; 智媒深度赋能期则依托人工智能与多模态分析, 构建“算法化治理”范式, 并直面深度伪造与社交机器人等新型风险。当前研究局限在于技术治理效能与数字鸿沟的认知落差, 亟需发展“包容性治理”路径。未来研究应着重社交机器人行为机制、人机协同事实核查系统及数字弱势群体干预等维度。

关键词: 智媒时代; 谣言传播; 算法治理; 数字鸿沟; 认知安全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要“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1]。当前, 我国社会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 截至2024年12月, 网民规模已突破11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78.6%[2]。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基础设施深度融入日常生活, 然而, 媒介场域的特性也使其成为谣言滋生与散播的温床, 网络空间成为谣言的重要聚散地。

与此同时, 媒介技术正经历新一轮深刻变革。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应用, 持续推动媒介生态转型, 一个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信息渠道多元的智能时代已然到来[3]。值得注意的是, 技术迭代与谣言的演变紧密相关: 媒介技术在重塑信息传播生态的同时, 也在深刻重构谣言生成和扩散的内在机理。具体而言, 谣言的传播机制正经历显著转变——从过去主要依赖以人为节点的经验性参与, 逐步进化到如今以智能技术为驱动力的网络空间算法化扩散[4]。这种媒介生态的根本性变化, 促使学界以更深层次的视角, 重新审视与评估网络谣言研究中潜藏的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

综上所述, 网络谣言的研究与治理, 是现阶段我国构建良好网络生态的必由之路, 而智媒时代的来临, 又为这一领域带来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型风险与挑战。尽管学界在网络谣言研究方面已积累部分成果, 但针对当前智媒环境的系统性、全局性研究仍显不足。在此背景下, 准确把握智媒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运行逻辑及发展趋势, 深入剖析其内在生成与扩散机制, 无疑是治理网络谣言源头、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1. 智媒时代网络谣言研究的路径梳理与分析

本研究借助CNKI数据库, 分别以“网络谣言”、“智媒时代”、“城市谣言”以及“AI(人工智能)”、“社交媒体”、“技术”、“区块链”等为关键词, 对2014年至今的相关研究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利用横纵向分析对智媒时代网络谣言研究的路径加以梳理与总结, 分析现有研究的视角、方法以及研究成果, 厘清现有研究的面向和重点内容, 从已有的研究特色和局限性中寻求突破点, 以推动该研究领域的创新与实践。

横向分析, 也叫截面分析, 指的是通过分析某个固定时刻的截面数据, 来反映研究对象或研究主题此刻的情形。本研究的横向分析将以研究主题、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作为切入点, 实现对现有研究重点以及价值旨趣的总体把握。纵向分析, 也叫历时分析, 指的是通过分析连续性截面数据组合而来的跨时段数据, 来反映相同研究对象或研究主题的历时性变迁。本研究所采用的纵向分析将以CNKI数据库作为整体期刊来源, 利用CiteSpace 6.3.R1软件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及时区图谱, 以了解和预测现有研究的重点及发展趋势, 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指导和参考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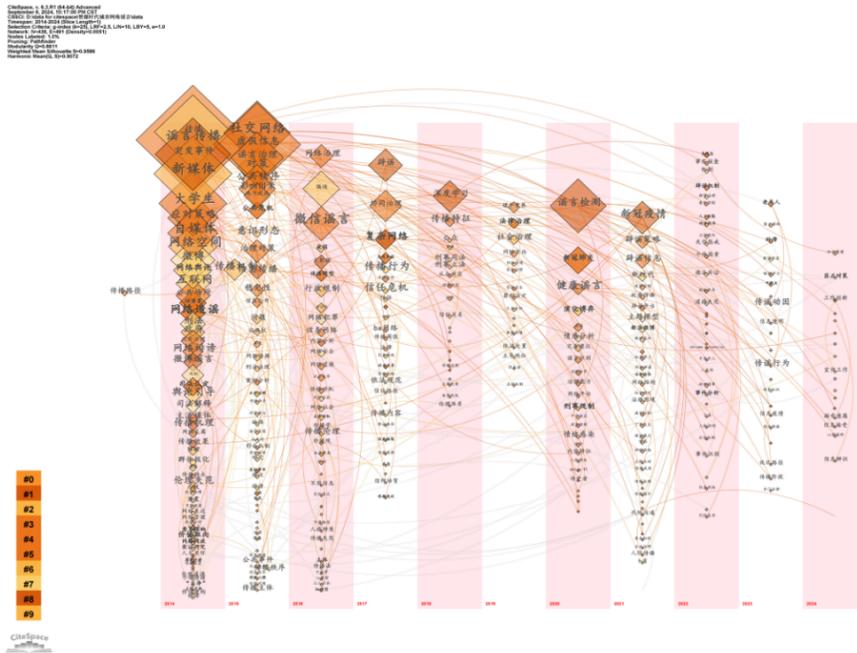


图2 网络谣言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2014-2024）

从网络谣言研究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谱（图3）整体来看，研究演进轨迹呈现显著的技术驱动特征：早期（2014-2018）以传播规律探究为主，后期（2019-2022）则转向智能治理实践。这种转变与智媒时代的技术赋能直接相关——算法推荐重塑了信息分发逻辑，大数据分析提供了谣言溯源的实证基础，而区块链技术的引入则为构建可信度评估体系提供了新路径。当前研究已形成技术应用与社会效应并重的双重取向，未来需在算法透明度、数据伦理等前沿领域深化探索，以应对智能化传播生态带来的治理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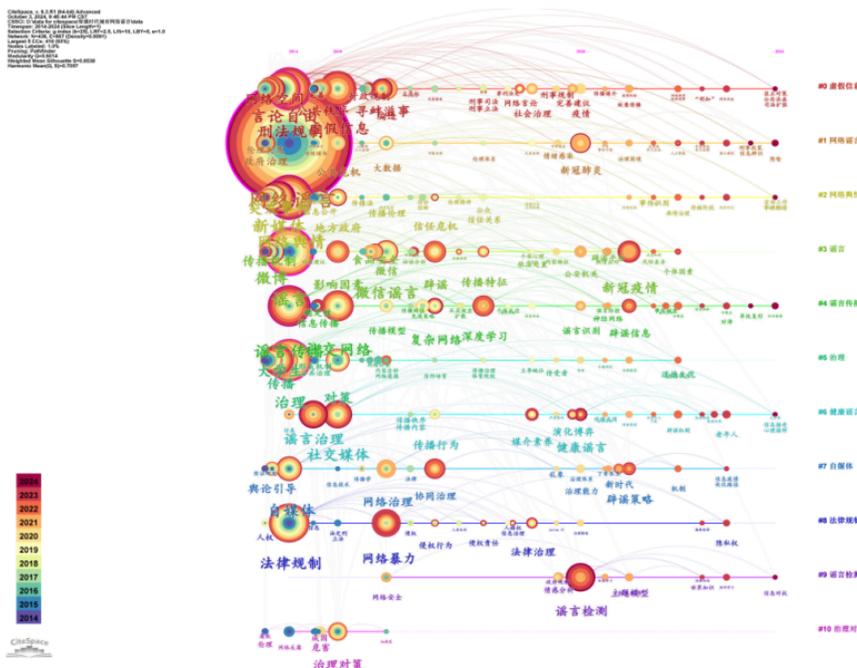


图3 网络谣言研究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谱（2014-2024）

研究范式的转变，体现为研究路径从传统质性分析向数据科学范式的结构性演进。早期研究多依托社会学解释框架，采用深度访谈、个案研究等质性方法，聚焦特定谣言事件的传播现象与社会情境互构关系。随着计算社会科学的勃兴，学界逐步构建起混合研究方法体系，有机整合扎根理论、传播动力学建模与机器学习

习(ML)、自然语言处理(NLP)等技术工具,实现微观行为解析与宏观传播规律揭示的方法论协同。例如,丁学君的研究基于经典SIR模型,构建了考虑促谣者和辟谣者共存的SPIDR模型,并对其传播机制进行了理论与仿真分析。研究发现,促谣者的存在显著促进了谣言扩散,而辟谣者的增加能够有效减少传谣者的数量,从而抑制谣言传播[5]。何静和陈逸然的研究基于大语言模型(LLM),结合MBTI性格类型和SEIR模型,对三种典型社会网络结构(无标度网络、随机网络、分层网络)中的谣言传播特性和治理策略进行了系统探讨[6]。通过构建具有解释力的数学模型与计算实验平台,研究者得以系统解构谣言传播的多维动力学机制,既涵盖信息扩散的拓扑路径与临界阈值,也深入受众认知图式与群体心理交互的潜在规律。研究范式的革新不仅推动了传播学理论的可计算化转型,为智能媒体环境下谣言传播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及精准干预提供了兼具理论自洽性与实践操作性的技术框架。

1.1.2. 横向分析

从整体研究涉及的领域来看,学界主要将网络谣言研究置于新闻传播、社会学、法学及行政管理等领域进行探讨。本研究在进行横向分析后发现,现有研究在研究主题、对象以及方法等方面均有不同的侧重。

从研究主题来看,图表中关键词强度的变化凸显出网络谣言研究在过去十年中的显著转向。早期(2014-2017年)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微博”、“传播”、“谣诼罪”等核心节点,主要探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的谣言生成与扩散机制,并在“诽谤罪”等法律框架下探索治理路径。自2016年起,技术驱动特征凸显,“大数据”、“谣言检测”、“治理策略”等关键词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和主题,并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谣言检测”在2020-2024年间持续突出,智能化检测手段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大数据等已成为当下网络谣言研究的重要议题,研究更加关注新技术手段如何影响谣言传播以及如何有效应用这些手段进行辟谣。例如,付阳认为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网络谣言的传播门槛显著降低,且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和个性化推荐算法,谣言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得到了极大扩展[7]。杨洋洋在其研究中针对智媒时代网络辟谣信息传播的离散化、内容模糊化和治理复杂化问题,基于引爆点理论提出了“数据层→画像层→模式层”的网络辟谣信息画像与治理框架,并归纳出智媒时代下网络谣言治理的三种主要模式:用户助推模式、内容导向模式和环境驱动模式[8]。黄园则聚焦于AGI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网络谣言传播问题,针对传播主体多样化、内容高度逼真化和传播隐蔽化等特征,提出了“技术监测→智能识别→公众引导”的治理框架,并从警察的角度提供了应对AGI赋能网络谣言的系统性解决方案[9]。陈家榕与杜津宇的研究认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AGI)的网络谣言背景下,短视频平台应由被动的通知-删除机制转向主动审查与过滤模式,并结合法律责任与技术手段,构建多元协同的辟谣体系,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传播隐蔽性与内容定制化挑战[10]。

此外,自2020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引发了关于“新冠疫情”、“新冠肺炎”等相关谣言传播的研究热潮。后疫情时代,新冠疫情成为关键研究情境,相关谣言呈现传播复杂化、内容情绪化、影响长效化新特征:传播机制层面,徐萌通过分析疫情期间的网络谣言及辟谣信息,表明逆火效应在公众情绪受恐惧与焦虑驱动时,谣言的传播可能加剧,并揭示了谣言的传播与信息模糊性、情绪反应及辟谣策略的有效性密切相关[11]。葛明驹通过对新冠疫情初期网络谣言的议题建构和放大机制的研究,解构谣言“多模态—模糊性—警示性”内容特质,阐明其通过本地化叙事与恐慌动员实现风险放大的路径[12]。群体认知层面,张益萌等通过对大学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谣言认知差异的研究,证实了信息表达方式与地域指向性显著影响大学生传播行为,研究建议高校与政府应增强大学生的信息鉴别能力,主动防控网络谣言[13]。技术应对层面,陈鹏冰通过疫情谣言词汇库解析动词/名词/副词模式,为计算机自动识别提供语言学支持[14]。法治困境层面,吴立志和周雨薇在研究中指出疫情期间网络谣言不仅具有传统的低廉性和侵权性特征,还呈现出受时空维度显著影响、情绪化和生活化的特点[15]。从长远来看,研究的重心已经从早期的个别平台与谣言传播机制的研究,转向了涉及政策和法律框架的完善以及智能技术在谣言控制中的有效性评估的综合分析,特别是在智媒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地结合技术与政策手段应对网络谣言,成为学术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

从研究对象与方法论的演进来看,当前网络谣言研究呈现出理论深度强化、技术手段融合、分析维度拓展的显著趋势。在研究对象层面,学者们主要选取特定公共事件或典型传播平台作为分析载体,通过整合个体行为观察、情境化传播解析及媒介平台化运作的多维视角,系统揭示网络谣言的传播动力学特征、社会影响机制与治理路径创新。例如,王国华等选择2010年的地震谣言事件为研究对象,结合传播路径分析与文本分析法,揭示了信息不对称、安全感缺乏及从众心理对谣言生成的关键驱动作用,同时指出交互媒体对谣言传播的助推作用尤为显著[16]。匡文波则聚焦“7·23”甬温线高铁事故,以案例分析结合奥尔波特模型,提出谣言传播公式 $R = i \times a \times ia$, 并强调事件的重要性、模糊性与信息不对称性是谣言传播的核心变量[17]。类似地,顾金喜以2014年杭州余杭“中泰事件”为对象,通过案例分析法探讨权益受侵害、信息流瀑与群体极化等在谣言生成和扩散中的作用,提出信息透明与政府公信力建设应该作为谣言治理的重要路径[18]。通过细致的事件分析,这些研究丰富了情境化的谣言传播理论,为复杂事件中的谣言治理提供了实证支持。另一类研究以特定平台或媒介为研究对象,聚焦于新媒体环境下谣言传播的特性及

“舆情引导”、“生态治理”等跨学科主题，其中“传播对策”与“政府响应”的紧密关联凸显系统性治理诉求。这一演进轨迹表明，智媒时代的网络谣言研究已从传播机制解析，经技术治理探索，最终形成公共危机响应范式。当前的技术驱动型治理体系，正通过动态监测与伦理防控的协同，为信息生态建设提供核心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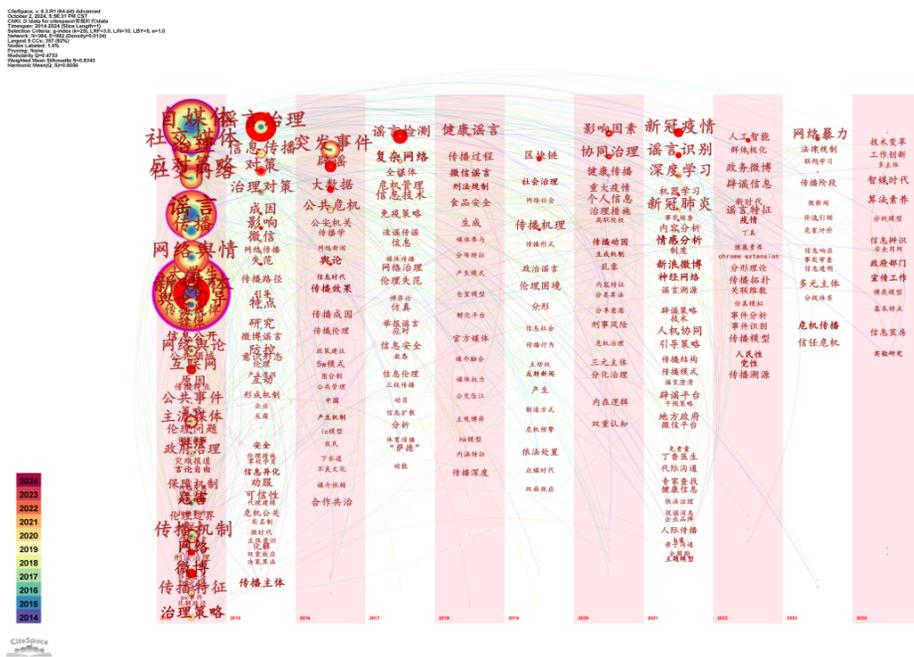


图5 智媒时代网络谣言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2014-2024）

1.2.2. 横向分析

在文献梳理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现有的相关研究常常被置于社会学、公共管理、计算机科学、法学以及互联网技术等专业学科领域来进行研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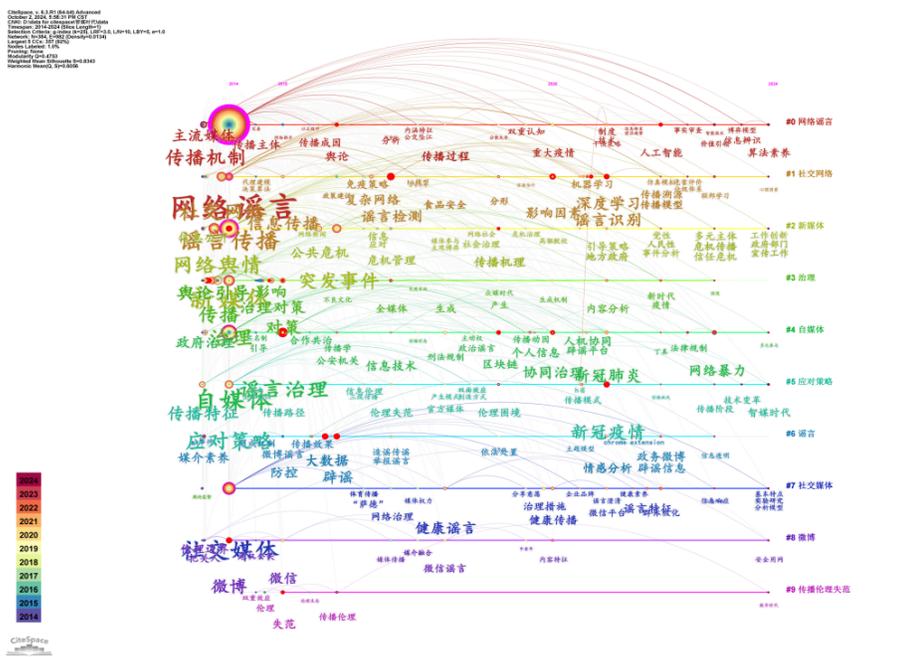


图6 智媒时代网络谣言研究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2014-2024）

Top 22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图7 智媒时代网络谣言研究关键词变化（2014-2024）

从智媒时代网络谣言研究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谱（图6）和智媒时代网络谣言研究关键词变化（图7）中研究主题及关键词的分布变化来看，现有研究视角日益多元，主要集中在技术驱动的分析与治理以及智媒背景下的传播特性与治理对策两个维度。在技术驱动的分析与治理维度上，现有研究主题日益聚焦于基于语义解析、情感挖掘与语境建模的深度学习方法，致力于构建高精度的谣言检测与治理模型。算法优化与区块链技术建构已成为智能化谣言治理框架的核心支柱。区块链技术因其去中心化与不可篡改特性，被视为构建信任机制的关键工具。马强和林浩瀚以新闻平台Steemit为例，探讨了区块链在谣言治理中的应用。研究发现，Steemit通过其分布式存储架构、不可篡改记录，结合声望指数与代币激励机制，能有效抑制谣言的生成与传播[21]。陈堂发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他强调在突发危机事件中，区块链凭借智能合约与精准溯源能力，能够高效追踪信息源头与传播链条，为谣言治理与理性追责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形成可靠的证据收集与责任认定机制[22]。

传播模型的精细化与仿真模拟为理解谣言扩散提供了微观视角。向卓元与陈宇玲基于SIR-CO模型，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微博谣言传播机制，该模型在传统SIR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怀疑与反谣言机制，通过六种用户状态（包括易感、感染、理智、旁观、怀疑和反对）来刻画谣言传播的复杂过程。此外，该研究通过Agent仿真方法强调了在早期阶段介入反谣言策略的重要性[23]。陈志毅与隋杰在其研究中结合DeepFM模型与卷积神经网络（CNN），通过联合建模文本特征、社交网络结构以及用户行为数据研究发现，在噪声干扰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未来的谣言检测系统应继续深入探索更高效的多模态信息融合策略，并提升对快速变化的传播环境的应对能力[24]。

传播特性与治理对策方面，学者们聚焦的核心在于揭示智媒环境下网络谣言的裂变式扩散特性及其传播路径中的关键节点，并针对这些特性引发的治理困境，探索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其核心目标是厘清平台、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应对谣言挑战的有效协同路径。例如王贤卿与吴倩倩的研究突显了复杂信息生态中的治理难题。他们认为疫情信息经历了“信息饥渴—信息爆炸—信息过载”的动态变化，其中虚假信息与事实交织，信息筛选难度增加，影响公众认知并加剧情绪波动。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应该通过精准政策、教育引导和规范治理，建立适应全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体系，从而有效管理舆情，促进社会情绪的的稳定与理性引导[25]。喻国明则从“后真相”时代的信息传播困境切入，通过分析碎片化的理解与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如何导致事实被扭曲，从而提出区块链的“分散—聚合”逻辑能够有效整合碎片信息，从而通过构建去中心化的公共新闻公告板实现更为可信的共识，重塑信息验证的信任基础，对抗谣言传播[26]。庞晓丹通过对不同辟谣平台发布内容的质化分析，发现协同模式下的辟谣平台展示出中心化与离散化兼容的特点，形成了权威

性和专业性并存的辟谣机制。此外,该研究特别强调新闻媒体在辟谣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可忽视,尤其在推动话题热度和参与度方面,媒体平台通过转发和互动推动辟谣信息的传播[27]。

从研究方法来看,智媒时代的网络谣言研究呈现出技术融合与多学科交叉的鲜明特征。其中,基于大数据的实证研究日益成为主流。这类研究常融合语义解析、情感分析、文本分类及主题模型等量化技术,对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多源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旨在量化建模谣言传播的动态机制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程亮、邱云飞、孙鲁结合传统文本分析方法与深度学习技术,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模态信息融合的微博谣言检测框架,通过综合考虑文本特征、用户行为及社交网络结构等多维数据,研究建议,针对微博平台谣言的高效检测,未来应加强模型的实时更新与自适应调节能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谣言传播动态[28]。贾若男等人则运用Neo4j图数据库与Louvain社区发现算法,构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辟谣信息主体关系网络,通过社区识别发现政府与大众媒体是核心辟谣主体,且政府偏向反驳谣言,而大众媒体则更倾向于否认谣言[29]。张大伟和王梓整合刺激—机体—反应(SOR)模型与心流体验理论,采用问卷调查与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实证验证了短视频平台上消极信息因素如何通过影响用户心理体验,进而驱动其不持续使用意向[30]。在揭示复杂的传播条件组合机制方面,苏宏元和黄晓曦使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2011-2016年间20个典型案例的分析确认,社交媒体是谣言传播的核心枢纽,而信息透明度低、传播主体蓄意造谣、受众负面情绪等要素的特定组合,构成了谣言加速扩散的关键动因[31]。

在智媒时代,网络谣言的研究对象更加多样化,一方面,传统的研究对象,如单一谣言事件的概念、传播内容及其影响在智媒时代的变化仍然是研究的核心,例如刘海龙与于瀛在其研究中以信息传播领域中“谣言”、“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及“假新闻”五大概念的阐释与重构,特别是在不同文化与政治语境中的功能、作用及潜在的政治后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对比分析中西方传播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主张通过去道德化和去政治化的方式,用“传言”来替代“谣言”,以拓宽公共话语空间,降低对公众言论的刑事化倾向。此外,研究明确区分了“误导信息”与“虚假信息”,强调精细化概念体系对于智媒时代网络信息治理的必要性[32]。与之相呼应,宋欢迎、刘聪和张旭阳以2011-2020年间中国36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事件的类型、传播速度、谣言传播、舆情性质、舆情解决情况、应对主体、应对速度以及处置结果都显著影响政府的回应效果,特别是事件中的谣言传播、舆情解决情况和曝光速度是最为关键的因素[33]。另一方面,智媒环境催生了更具复杂性的新兴研究对象。多平台、多媒体交互环境下的跨事件传播模式、AI生成信息对公众认知的影响等技术与社会互动效应成为研究重点。于晓华、喻智健和郑适以北京市新发地疫情期间的三文鱼食品安全谣言事件为例,通过生存分析模型研究发现,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恢复周期在智媒时代食品谣言冲击下较传统食品安全事件显著缩短[34]。曾文俐和王海燕针对灾害期间社交媒体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发现,AI谣言借助圈层传播与情绪驱动迅速扩散,其形式(如深度加工处理的视频、图片)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极大地增强了信息的现场感与可信度,从而加速恐慌情绪的蔓延[35]。张爱军与王芳的研究则进一步聚焦于深度伪造技术对政治舆论的影响,指出深度伪造技术通过“机器生成”和“复合生成”方式制造虚假信息以增强政治谣言和意识形态冲突,并通过信息的虚拟性、内卷化和迭代式生成推动政治舆论的极端化与常态化[36]。

2. 未来发展向度

梳理现有研究的主题、对象以及方法等的整体框架及发展趋势,并分析和总结研究的局限性后发现,未来相关研究可以在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治理路径的专业性以及研究视角的创新性上发力,进一步对社交机器人与多模态谣言、自动事实核查技术以及数字鸿沟这三个主题进行探讨,促进智媒时代网络谣言研究角度与主题的延展与创新。

2.1. 研究对象: 社交机器人与多模态谣言

从谣言演化视角来看,传统时代与网络时代的谣言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二者的主要差异体现在传播媒介的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扩散方式的变化。网络谣言本质上仍然是谣言在数字平台上的传播,其主要区别在于传播方式从口语或纸媒传播转为网络媒体。然而,进入智媒时代后,谣言的生产和传播模式均发生了显著的变革。

一方面,智媒时代网络谣言的生成机制已从早期的人为驱动演进至人机协作模式。有研究显示,社交媒体中社交机器人正逐渐成为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重要推手,例如在Twitter平台上,社交机器人的活跃账户占比介于9%到15%之间,并且这一比例呈现上升趋势[37]。其潜在的危机是,这些自动化实体具有高效且稳定的信息生产与传播能力,即使它们当下的用户账户占比不高,但却能稳定地生产出大量的信息内容,将其充斥于网络空间并占领话语高地。Akamai发布的《互联网现状》证实了这一点;机器人流量占互联网总流量的42%,其中65%为恶意流量,机器人生产在互联网信息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38]。另一方面,智媒时代的谣

言传播呈现多模态化转向。与传统媒体时代主要依赖文本信息不同，当前网络谣言的传播不仅包括文字，还涵盖了图像、视频及情绪等多模态内容形式。当前的主流谣言治理策略依然侧重于利用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技术，对大量文本数据进行深入的语义特征提取，以此作为识别网络谣言的核心依据，但这种文字识别方法已显得力不从心。面对多模态内容的复杂性，传统的信息鉴别技术难以有效应对图像和视频中的虚假信息。此问题在当前的社交平台中尤为显著，故此，学术界应当重点关注社交媒体中由社交机器人驱动谣言治理，尤其是其内容中的情绪传播。首要任务是阻断社交机器人传播链，尤其警惕其情绪传播引发的舆情风险。此外，未来的研究更应拓展多模态治理框架，将研究视野从文本延伸至图像/视频识别技术，同时深化社交机器人行为机制研究，从而构建适应智媒生态的治理对象体系。

2.2. 治理路径：自动事实核查技术

主流观点认为，事实核查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美国新闻组织对报道刊发前的事实核对。实践层面的“事实核查”一词，最先见于1927年美国的《纽约客》，其成立事实核查部，核查将要发布的新闻稿件、文学作品等[39]。后至20世纪中期，事实核查扩展到欧洲等地[40]。弗拉乔斯和里德尔（Vlachos & Riedel）在2014年的研究中描述了以下典型的事实核查步骤：提取要进行事实核查的陈述、构建适当的问题、从相关来源获得证据、使用这些证据做出判决[41]。其中，记者们需要对其中的每个环节进行评估和比较，需要具备先进的知识与技术进行彻底的研究以确保核查结果的准确性，还需要具备先进的写作技巧以避免陈述“他说/她说”的事实。写作一篇典型的事实核查文章大约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复杂的事实核查可能需要更长时间[42]。

在传统媒体时代，事实核查多运用于对传统报业上的虚假信息进行核查与判决。而当前智媒时代，网络谣言与虚假信息横行于社交媒体场域，维护清朗的网络信息生态与正向的公众认知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与困难。传统时代的事实核查模式凸显出的重重困难，限制着核查文章的时效性和有效性，但这也为自动事实核查的运用创造了机会。利用人工智能（AI）、自然语言处理（NLP,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等技术进行信息核查越来越有必要，核查方法从人工核查转向人机协同的核查模式[43]。目前国际自动事实核查领域主要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事实核查员通过声言检测、证据检索和声言验证三个阶段参与事实核查实践，致力于提高其人工核查的效率。例如开发人员通过“可核查声言检测”和“声言匹配”两种步骤检测声言，以最高优先级的方式达成对虚假信息的声言进行初步筛选的目的。

相较于国外的事实核查发展，国内的事实核查起步更晚，但却有更加明确的谣言治理导向，即事实核查广泛应用于辟谣。2007年，事实核查一词首次在国内文献中被提及[44]，但彼时国内研究对其没有引发太多讨论。到2010年开始，我国一些传统媒体开始涉足事实核查领域，内容都以网络辟谣为主[45]。如腾讯推出“较真”平台、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和新华网联合推出中国互联辟谣平台、澎湃新闻推出“澎湃明查”等，国内事实核查项目在社会层面发挥着辟谣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诸多研究者也提出事实核查对于网络舆情、谣言治理、公共资源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性[46-48]，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研究在自动事实核查方面的关注明显不足，且研究领域较多存在于计算机层面的算法研究。

综合来看，智媒时代，多元化的内容形态和海量信息资讯给谣言治理和事实核查都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为了应对当前信息生态中充斥着具备高速生产与传播能力的虚假信息，借助自动事实核查的手段进行对症治理是目前谣言治理研究的重要面向。为了维持核查的自动化效率与认知价值之间的平衡，未来自动事实核查的研究或许应当转向人机协同的、人在“环内”的方法，人工智能在验证工作的不同阶段支持事实核查，探究“人机交互”的核查技术，而不是全自动的事实核查[49]。对比国内外已有研究来看，尽管当前全球的自动核查技术都处于相对早期的发展阶段，但国内研究应当借鉴当前国际自动事实核查的已有实践，对自动事实核查进行本土化探索与补充。

2.3. 研究视角：网络谣言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这一概念可追溯至“知识鸿沟”理论。自从美国学者蒂奇纳于1970年首次提出“知识鸿沟”的理论假设，这个概念就一直体现出强大的社会解释力[50]，用以描述社会信息流动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信息获取与利用能力差异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扩大。随着智能化媒体技术的迅速崛起，个体被更深层次地嵌入到多维且复杂的媒介生态系统中。在此背景下，不同地域、行业以及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群，在媒介技术的应用水平和数字资源的获取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这种“信息技术差距”不仅加剧了个人之间实践技能的不对称性，还导致了权利实现上的不平等，进而加深了各群体间的发展鸿沟。

既有的网络谣言研究大多聚焦于特定场景下的谣言治理，而从“数字鸿沟”的视角探讨网络谣言的研究尚显不足。数字鸿沟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之间，同时也存在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之中，特别是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而言，在获取和理解网络信息方面存在较大障碍。这些“数字弱势群体”往往成为网络谣言的高发区域，因为他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时，缺乏必要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信息甄别技巧，更容易受到误导。

在当前智能化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虽然澄清谣言、传播真相、提供科学解释等措施已广泛应用于网络空间，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上述努力难以有效触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从而增加了谣言治理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因此，未来的网络谣言研究应当拓宽视野，不仅要考虑传统的、具体的谣言传播环境，还需深入分析横跨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谣言传播模式，特别要关注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声音微弱的“数字弱势群体”。关注他们数字素养的提升、增强其对虚假信息辨识、构建更加健康平等的网络生态环境，是智媒时代网络谣言研究的重要路径。

3. 结语

本文梳理与分析相关的课题研究后发现，已有研究在研究深度、广度以及方法上存在一定局限性。部分研究仅聚焦于对社交媒体的适用性和影响的探究，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层次感有待提升，研究方法需进一步丰富。未来的研究可聚焦于网络谣言在智能媒介介入之后的潜在演变，以多模态谣言内容为重要关注点，探索出更加适用于网络谣言的治理技术，寻求缩小网络谣言在不同群体之间的认知鸿沟，最终搭建出基于中国视角、反映中国特色的理论模型，丰富未来网络谣言研究的视角，为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 [2] CNNIC. 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R]. 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4.
- [3] 翟月荧. 网络谣言的传播与治理 [J]. 东岳论丛, 2023, 44(8): 150-156.
- [4] 黄河. 网络谣言的智能化演变及治理 [J]. 人民论坛, 2023(4): 62-65.
- [5] 丁学君, 洪野, 田勇. 考虑促谣及辟谣的在线社交网络谣言传播模型 [J/OL]. 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 1-10[2025-05-29].
- [6] 何静, 陈逸然. 基于LLM-based Agents 多样化社会角色模拟的谣言传播影响因素研究 [J/OL]. 控制工程, 1-8[2024-12-02].
- [7] 付阳. AI时代网络谣言传播问题及对策分析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4, 15(19):10-13.
- [8] 杨洋洋. 数据驱动下网络辟谣信息画像与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引爆点理论 [J/OL]. 情报科学, 1-14[2024-12-02].
- [9] 黄园, 刘明玺. AGI下网络谣言治理：特征、挑战与应对 [J]. 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4, 34(3): 21-29.
- [10] 陈家榕, 杜津宇. 智能化演变背景下短视频平台的谣言治理路径 [J]. 东南传播, 2024(1): 72-77.
- [11] 徐萌. 网络谣言逆火效应及其抑制——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 [J]. 新闻知识, 2023(12): 16-22+87.
- [12] 葛明骊. 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的风险议题建构、风险放大及其治理——基于对新冠疫情早期网络谣言的分析 [J]. 新闻大学, 2023(8): 44-58+118.
- [13] 张益萌, 王馨, 董子泽, 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大学生群体认知差异研究 [J]. 中国卫生法制, 2024, 32(2): 44-49.
- [14] 陈鹏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词汇研究——以COVID-19网络谣言为例 [J/OL]. 语言研究, 2024(2): 25-36 [2024-12-02].
- [15] 吴立志, 周雨薇.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困境与出路 [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2): 1-8.
- [16] 王国华, 方付建, 陈强. 网络谣言传导:过程、动因与根源——以地震谣言为例 [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3(2): 112-116.
- [17] 匡文波, 郭育丰. 微博时代下谣言的传播与消解——以“7·23”甬温线高铁事故为例 [J]. 国际新闻界, 2012, 34(2): 64-69.
- [18] 顾金喜.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47(3): 93-103.
- [19] 李彪, 喻国明. “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条谣言的分析 [J]. 新闻大学, 2018(2): 103-112+121+153.
- [20] 王晰巍, 孙哲, 姜奕冰, 等. 社交媒体网络辟谣回音室效应分析模型及实验研究 [J]. 现代情报, 2024, 44(10): 3-17.
- [21] 马强, 林浩瀚.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网络谣言治理模式探析——以新闻平台Steemit为例 [J]. 新闻论坛, 2018(4): 29-33.
- [22] 陈堂发. 突发危机事件中谣言追责的理性问题——基于区块链技术支撑的讨论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5): 15-21.
- [23] 向卓元, 陈宇玲. 微博谣言传播模型与影响力评估研究 [J]. 科研管理, 2016, 37(1): 39-47.
- [24] 陈志毅, 隋杰. 基于DeepFM和卷积神经网络的集成式多模态谣言检测方法 [J]. 计算机科学, 2022, 49(1): 101-107.

- [25] 王贤卿, 吴倩倩. 全媒体时代重大疫情网络舆情的特征、影响及引导策略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0(3): 102-106.
- [26] 喻国明, 冯菲. 区块链对后真相的重新建构：“分散—聚合”模式的设想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 41(5): 1-4+11.
- [27] 庞晓丹. 协同模式下的网络辟谣研究 [J]. 新媒体研究, 2024, 10(16): 14-19.
- [28] 程亮, 邱云飞, 孙鲁. 微博谣言检测方法研究 [J].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2013, 30(2): 226-228+262.
- [29] 贾若男, 王晰巍, 孙玉姣. 社交媒体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辟谣信息主体研究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1, 65(19): 16-25.
- [30] 张大伟, 王梓. 用户生成内容的“阴暗面”：短视频平台用户消极使用行为意向研究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8): 137-144.
- [31] 苏宏元, 黄晓曦. 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J]. 当代传播, 2018(1): 64-67+71.
- [32] 刘海龙, 于瀛. 概念的政治与概念的连接：谣言、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与假新闻的概念的重构 [J]. 新闻界, 2021(12): 23-40.
- [33] 宋欢迎, 刘聪, 张旭阳.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回应效果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1-2020年我国36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证分析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2, 45(1): 152-158+176.
- [34] 于晓华, 喻智健, 郑适. 风险、信任与消费者购买意愿恢复——以新发地疫情食品谣言事件为例 [J]. 农业技术经济, 2022(1): 4-18.
- [35] 曾文俐, 王海燕. 突发自然灾害事件中的谣言传播机制及治理路径研究——以“7·20”河南特大暴雨事件相关谣言为例 [J]. 科技传播, 2022, 14(12): 77-80.
- [36] 张爱军, 王芳. 人工智能视域下的深度伪造与政治舆论变异 [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3(4): 29-36+106.
- [37] CALDARELLI G, DE NICOLA R, DEL PRETE L, et al. The role of bot squads in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n Twitter [J]. Communications Physics, 2021, 3(81): 1-15.
- [38] Akamai. State of the Internet / Security: Web Attacks and Gaming Abuse [EB/OL]. (2021-03-30)[2024-07-30]. <https://www.akamai.com/our-thinking/state-of-the-internet-reports/state-of-the-internet-security-web-attacks-and-gaming-abuse>.
- [39] 王君超, 叶雨阳. 西方媒体的“事实核查”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J]. 新闻记者, 2015(8): 21-26.
- [40] 丘濂. 解密德国《明镜》周刊事实核查部 [J]. 中国记者, 2013(11): 124-126.
- [41] Vlachos A, Riedel S. Fact checking: Task definition and dataset construction [C]// Danescu-Niculescu-Mizil C, ed. Proceedings of the ACL 2014 Workshop on Language Technologies and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Baltimore, MD: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4: 18-22.
- [42] Hassan N, Adair B, Hamilton J T, et al. The quest to automate fact-checking [C]// Proceedings of the 2015 Computation + Journalism Symposium. New York, NY: 2015.
- [43] 马晓彦. “事实核查”在新传播生态环境下的演变及应用 [J]. 编辑之友, 2017(10): 38-42.
- [44] 向西. 去展开和探索一个世界——访《时代》周刊时任总编辑詹姆斯·凯利 [J]. 中国记者, 2007(6): 87-89.
- [45] 雷晓艳. 事实核查的国际实践：逻辑依据、主导模式和中国启示 [J]. 新闻界, 2018(12): 12-17.
- [46] 李智刚. 事实核查：网络时代的舆论校准器——以《澎湃·明查》的新闻实践为例 [J]. 青年记者, 2022, (13): 37-39.
- [47] 姬德强, 蒋效妹, 朱泓宇. 虚假信息研究与事实核查的多维视角 [J]. 新闻与写作, 2024(7): 113.
- [48] 黄崑, 李鸿, 赵晨, 等. 基于事实核查平台的信息甄别学习资源调研与启示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4, 68(12): 56-69.
- [49] MONTORRO-MONTARROSO A, CANTÓN-CORREA J, ROSSO P, et al. Fighting disinformation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ndamentals, advances and challenges [J]. El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ón, 2023. DOI:10.3145/epi.2023.may.22.
- [50] TICHENOR P J, DONOHUE G A, OLIEN C N.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0, 34(2): 159-170.